

2301

崇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崇庆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保路护国 叱咤风云

——民国初年川西豪杰孙泽沛……………

……………刘步超 张伯龄 (1)

回忆马老二、三事……………王润轩 周之鹄 (9)

我所知道的杨永浚先生……………杨永廉 (16)

川西巨匪陈福安……………何彦军 肖慕恒 (20)

驰骋棋坛四十年

——记我县名棋手田宝文……………

……………石冠觉 (33)

中日友谊代代传……………王淑忠 周之鹄 (41)

记一九四七年我县选举国大代表内幕……………雷志华 (48)

赵鼎臣与袁育生错综复杂的暗杀经过……………袁瑞麟 (53)

我在崇庆县地方法院听到的三件事……………邓先伟 (57)

高雪英惨案始末……………邓先伟 (60)

崇庆县福鑫源商号的兴衰……………孙味棋 (63)

民国时期崇庆县工商业者的遭遇……………孙味棋 (68)

田赋征实见闻……………赵嘉英 (73)

谈解放前崇庆县的各种“会”……………王泽波 王蓀青 (80)

“同德”缺德“慈善”非善

——崇庆县反动会道门组织同德慈善会面面观

……………陈旭东 张 平 陈柏青 (91)

EA48/28

崇庆特产川芎与玉京..... 周硕才 盛冠群 (104)

西江桥畔今昔谈..... 杨永廉 (111)

保路护国 叱咤风云

——民国初年川西豪杰孙泽沛

刘步超供稿 张伯龄执笔

在保路运动和护国之役中，四川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人物，**（江）崇（庆）郫（县）**的**吴庆熙**，**孙泽沛**、**张达三**、**丁泽煦**被群众誉为“川西四大豪杰”。崇庆县的**孙泽沛**，先后带领一支同志军和护国军，驰骋于成都平原，辛劳征战，叱咤风云，和群众一起，在崇庆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民国《崇庆县志》上称：“泽沛，盗之有道者也。”此话只讲对了一半，**孙泽沛**的确是个“有道”之人，然而，终其一身，却不能以“盗”视之。诚然，他早年曾沦为“盗”，但自辛亥保路事起，他就投身于火热的人民斗争，而成为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了。

清光绪二年（1876年），**孙泽沛**出生于崇庆县石观音（今观胜乡）西北杨家巷子一个私塾老师的家庭。幼年，随父**孙雨村**的私塾读过几年书，稍长，学过木匠。在随师走村串户的木匠生涯中，听了许多《水浒》英雄故事，对那些侠义之士萌发了钦慕之情。成人后，身材魁梧，赳赳有力，慷慨好义，敢作敢为。一次，他听了表兄**王宪章**的戏言，将地主童兴哉的小儿子关在柜子里，不料闭气而死。事经败露后，童氏向官府控告，**孙泽沛**便逃走郫县乡间。从此走上了浪迹

江湖的道路，渐与绿林豪俊过从甚密，以打富济贫为事。

泽沛虽起于绿林，但对他的兄弟伙有“不准烧杀，不准奸淫，不准倒打码子，不抢商人，专整大户官绅”之规约。在郫县避匿时，曾率众在崇宁、郫县路上，拦劫上缴官府的“皇银”，分给缺衣少食的贫民。官府悬赏捉拿不获。一年后，才因人出卖被郫县防务捕获入狱。不久，其家变卖田产，买通牢卒，使县衙失火，孙泽沛便趁机越狱。

孙泽沛越狱后，先后化名游虎成、王再田，逃到邛崃南河坝种过菜，又在大邑两河口、李岗子等地当过木匠，暗与四方豪俊往来，聚谋起事。

宣统三年（1911年）春，观音乡总保赵锦堂鉴于风云变幻，人心浮动，保荐孙泽沛为乡团队队长，孙乃重返故里。不久，保路事起，他经乡中袍哥大爷的介绍，加入了保路同志会。同年五月，孙泽沛赴新津参加川西南哥老首领侯宝斋在王爷庙召开的“九成团体”重要会议，返县后，便四出串联，筹备举事。闰六月初十（8月4日）孙泽沛又昼夜兼程赶到资州罗泉井，参加同盟会党人和哥老首领的“攒堂大会”。会上决定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定于阴历七月各地同时起义，以推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政权。会后，孙泽沛在乡以反清为号召，广邀大邑、灌县、崇宁、郫县等地哥老会兄弟前来聚义。短期内集聚百余人，并有余显之和留日学生帅国瑛自荐为军师。缺少武器，他们公开向团防局和地方绅士借枪支弹药。县绅陈志棠等人主动支援。县中木商王子尼也将数十名工匠组织起来，并约集一批农民，共百余人，成立同志军，甘受孙泽沛的节制。孙泽沛的人马日益壮大，特制了

一面湖绉大旗，上书斗大的“沛”字（一说“孙”字），以壮军威，于七月初在石观音正式起义。

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成都血案（注）发生后，泽沛和温、郫、灌、大等县同志军首领率部进攻成都，营救蒲殿俊、罗伦、张澜等九人。孙泽沛的队伍攻打南门，与广汉同志军互相策应。为约束部众和安定民心，孙派人四处张贴布告：

本军招集同志，原为争路保民；所过秋毫不犯，并不筹款一分；若有在外滋扰，军法决不容情，特此布告周知，父老昆弟勿惊！

成都红牌楼战斗后，西路同志军首领招集孙泽沛和温江同志会长兼团防总局团总曾少卿等，在郫县城隍庙举行军事会议，统一部署，配合同志军学生大队向西门进军。孙泽沛还和大邑县女同志军首领王三娘一道，采取共同行动，攻打西门外的清军。

围攻成都失利后，同志军分兵转据各州县。孙泽沛在郫县与张达三等会商后，即率兵千余，分为三队，经赵家场进驻温、崇交界的廖场一带。此间，他曾派王子尼率队砍断双流金花桥一带电杆电线，截断赵尔丰与其亲信傅华封所率清军的联系，配合新津同志军作战。

七月二十六日（9月18日），赵尔丰派往崇庆镇压罢市的两连官军中，一连奉调返省，行至三渡水，孙泽沛和温江同志军首领吴庆熙配合，于河岸芦苇丛中伏击官军，擒斩其队官陈锦江，毙敌百余人，缴械百余支。

八月，孙泽沛又协同其他同志军，于羊马场夜袭赵尔丰派往崇庆城的官军，战不利，转入西北山区整顿。

自成都血案后，崇庆知州薛宜璜奉赵尔丰令，率队至城隍庙严禁保路协会开会，然而，县中各区同志会已纷纷举旗声讨赵尔丰。八月十六日（10月7日）同盟会员黄树藩等在州城举事，逼薛知州交出印信，夺得了政权。并于当夜黎明，以西湖举火为号，召集四乡同志军入城，直抵州廨，毁狱裴署，人心大快。但因参与举事的警务巡官马光耀与孙泽沛有夙怨，致使孙泽沛的部队不能入城，后经监生康祚祥居间调停，方得驻城中试院。

州中同志军议定：分东南西北中五军，孙泽沛为西军统领。他统领西军后，即托帅国璘延聘龙应铭到军中作参谋长。帅国璘向孙泽沛进言：“城中不可驻兵，不若散处村落为宜。”孙泽沛踌躇未决。龙应铭力言：“一旦有事，非惟城不可守，且重贻民患，非同志初心也。”孙泽沛当日即移军北乡与温江交界的合江殿一带驻防。由于孙泽沛一意延揽人才，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所以李子俊、王华峰、程载扬、唐大饒等有识之士，都陆续来投西路军。温江的李国定，大邑的且承先等都主动前来和他配合，共谋策应。

崇庆同志军的五支队伍中，孙泽沛的西军军令肃然，战斗力最强。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东军文明南军恶，西军整齐北军弱，惟有中军嗜杀人，不知将来何下落！”后来，赵尔丰派兵攻打新津同志军指挥部，途经崇庆，中军马光耀不战让路，州同王某畏于中军嗜杀成性，暗逃出城，将印交与孙泽沛，可见其对孙的信赖。成都发生兵变，诸军入军政府劫军械，纵掠省城。崇城也被劫掠一空，竟打死数人，以中军马光耀为主谋，他军也有参与者，只有孙泽沛的西军驻三十里外，不与其事。

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新津失陷后，崇庆形势也急转直下。二十四日（11月14日）官兵籍没黄桷藩家，薛知州卷土重来，要“剪除同志军暨发起者诸人”，同志军遂转移山乡僻远处潜伏，孙泽沛乃移军灌县普照寺。

十月初七（11月27日），省城宣布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任都督，孙泽沛赶进省城祝贺。到十月十八日，成都兵变，波及各州县，孙泽沛立即率军到成都，和吴庆熙、侯国治等的同志军一起，维护蓉城社会治安。

成都兵变后，尹昌衡出任都督，重编陆军，崇庆同志军西军编为川军第二镇第五标，孙泽沛任标统（后改为团长职衔），驻凤凰山。因西军人数多而纪律严，在颁发标统印至部队时，专门以一乐队和“沛”字全军牌表为前导，以示荣宠褒扬。

民国四年（1915年）初，袁世凯企图掌握川军为其当皇帝作后盾，派亲信陈宦率北洋军三旅入川，督理四川军务，为夺去川人军权而改编川军。孙泽沛与陈宦不协，就毅然遣散队伍，托病辞职，回石观音韬光养晦去了。

不久，袁世凯称帝，蔡锷奋起反袁护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奉孙中山先生指示，秘密联络辛亥革命后散伏各地的民军组织，准备与附袁川军作战，卢师谛派人到崇庆县密约孙泽沛反袁，孙泽沛即邀温、郭的吴庆病、丁泽煦、张达三等人聚谋举事。

民国五年正月初一（1916年2月3日），孙泽沛重啸风云，再度起义了。当时县知事为向远源，向闻孙泽沛又起，惊恐异常，忙派人往省城报警，请求增兵援剿。正月初三，向亲自出马，率警队二百余人前往石观音捕缉孙泽沛。因时

值新岁，向沿途逗留，不知吴庆熙、丁泽煦、张达三都在孙泽沛处，待他率队赶到孙家，孙泽沛等人已不知去向，只得怏怏而回。在返城路上，向滥捕数人，谬指为贼，绑回城里，一齐杀掉，以泄其愤。

正月初九，陈宦派川西清乡司令黄树成带一营人来崇坐镇清剿。十五日，以县警团为向导，开赴石观音搜捕孙泽沛，结果又是扑空。官军放火烧毁孙泽沛家后，又去包围孙泽沛表兄王宪章的家，把王抓走，指为“同谋”，要罚银万元。王宪章不服，被押送省城，终因无凭无据，难以定罪，加之出资求情，不久释放。

县城虽驻重兵，但全县树护国军之旗而起之势已锐不可当。孙泽沛再举义旗后，四方民众蜂拥而至，队伍驻扎在观音乡北的汪家石桥附近，“沛”字军旗在“鹿子坟”上迎风飘扬。一天，孙泽沛派本乡胡道士前往白马场散发和张贴传单，胡道士不幸在彩虹桥被捕斩首，孙泽沛深为哀痛，数日不已。

二月初，“川西四大豪杰”经过协商，联合成立了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吴庆熙任司令，孙泽沛任副司令。司令部设在温、崇、双三县交界的刘家濠上游。这样，长期分散在川西诸县的自发力量又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武装斗争了，为配合滇军入川作好准备。

二月初七夜，陈宦派省军前来征剿，护国军司令部鉴于众寡不敌，不宜硬拼，便撤至大邑沙渠镇。后来又采纳了参谋长熊兆渭的建议，为截断官兵各属饷源，不取成都，而挥戈直指邛崃、蒲江。

二月二十九日（4月1日），孙、吴的护国军直抵邛崃。

原拟绕邛赴蒲，不准备入城，但城中防军连长王某闻风丧胆，托故率队出城远遁。护国军探知此况，决定叩城。前锋数十人由北城缘梯而上，仅一小时，数百大队人马就开进城内。一入城，沿街演说，令勿惊扰。军士严守纪律，买卖不欺，市上照常营业，并不搜查，只将县狱囚犯释放而已。县知事避入周家祠，不敢露面。孙、吴探知此吏尚属贤良，便传令回署视事，决不加害，并嘱其向县绅代募军饷。由于时间仓卒，知事仅筹集到二千余元。

三月初一，省军跟踪追至，驻城北好静庵，向城上轰炮。直至初二，炮声不止，孙、吴缺乏弹药，城中居民惊恐异常。不得已，孙、吴请福音堂英国牧师韦继三从中调处，议定让护国军于初三退出县城。当护国军由南河绕至两河口时，省军背信毁约，伏兵开炮。护国军仓卒应战，损失严重，于初四日由大邑灌口退回崇庆县境。

孙、吴领军回县，驻在布金寺，打散的士兵陆续归来，清乡司令黄树成想乘护国军立足未稳之际，把它一网打尽，建立奇功，就同知事向远源率部前往。不料半路中了孙、吴的伏击，被打得落荒而逃，退到何家场。清乡省军在盐店里还没等端稳饭碗，护国军蜂拥而至。黄树成腹背受敌，被团团围住，忙派人去调县城驻军李维翰营来救援，才保黄树成和向远源逃回县城。从此，黄部士气低落，谈虎色变；而反袁声势日强，白塔山、怀远镇、羊马场各地护国军层现错出，黄树成、李维翰穷于防守，徒唤奈何！

七月，孙、吴联合各路护国军号称七军三千人，围攻县城七天七夜。李维翰部龟缩城中，不敢出战，固守待援。护国军亦因缺乏攻坚器械，未能攻下县城。

八月，蔡锷赴日就医，推督军之职于参谋长罗佩金。罗佩金督理四川军政后，下令嘉奖护国有功的各路起义军，并实行改编，孙泽沛升为团长。

护国之役结束后，孙泽沛辞去上校团长之职回乡闲居，以明其“为国、为民、不为官”的心迹。政府拨给五千银元，以安其家。他在石观音街上买房数间，改建为“忠烈祠”，以悼念辛亥保路运动和民国五年的反袁护国战役中，追随他出生入死、血洒沙场的烈士！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孙泽沛病逝于成都科甲巷寓所，享年四十七岁。后扶柩回县，落葬于街子场孙家沟彭家林。

（注）成都血案：这是赵尔丰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一手制造的大屠杀，也是四川同志军起义的起点。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借口《川人自保商榷书》“条件隐含独立，尤为狂悖”，向保路运动轴出了屠刀，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江三乘、张澜、王铭新等人诬骗至督署加以逮捕。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群众从四面八方齐奔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诸人。嗜血成性的赵尔丰，竟下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者，惨死数十人。这就是清朝统治者在面川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成都血案。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回忆马老二、三事

王润轩 周之鹤

中国经济学、人口学专家马寅初老先生离去人间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见先生端庄慈祥的容颜，不闻先生精辟宏伟的理论更是三十多年了！可是，先生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仗义的直言和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却永远、永远存留于我们的脑际而没世难忘！今谨写此文“回忆先生二、三事”以纪念先生的逝世两周年。

一、在重庆大学被劫持

一九四〇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紧张阶段，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我（王润轩）当时在重大统计专修科读书。

一天下午，从大礼堂传来“马先生要被抓走，现正在讲演”的消息。立刻，各院系同学和我都奔向大礼堂。

一进礼堂，已是座无虚席，有些同学一面听，一面低声互相议论：

“那不是宪兵团的走狗团长吗，坐在最前面一排穿军装的。”

“还说拿有蒋介石的‘手谕’来请马先生吃饭哩！”

“马先生说：‘要我走，我也得向同学们告别，到礼堂

给同学们讲几句话。’那家伙才从马先生家里一同到这里来的。”

这时马先生讲话已有一阵了，讲话的主要片段有：

大敌当前，只是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是谁出了力出了钱呢？前方浴血抗战的是谁？后方交粮出税的又是谁？好多人颠沛流离，生活无着，可是有的人却骄奢淫逸、为所欲为，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去，到外国去买橡胶园，他们的钱多得很，他们子子孙孙的金棺材都打起了，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还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吗？！

“在外国早已实行有 Capital Levy，可以译为资本税，我们国家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叫那些吸尽民脂民膏的人，把钱拿出来！把日本打出去！（鼓掌）

“我们知道，一将成名万骨枯，主持国家大业的人，是来之不易，但是我们要蒋先生‘大义灭亲’，首先要把宋子文、孔祥熙的钱拿出来！（鼓掌）这就是我们国家要征收的资本税，或者叫战时财产税，这就是我的主张。

“赞成我这个主张的请举手！（全体举手）好！请放下。此外，我还有个要求，我要求今天之内把我这个主张，让沙磁区的人都知道，三天之内，全重庆的人都知道，十天之内，全中国的人都知道。接受我这个要求的请举手（全体举手）好，请放下！

“我还要说明一点，一个公民是有言论自由的，有人劝我不要以言论自由来损害国家的利益。我认为，我的言论从来没有损害过国家的利益，恰恰相反正是想维护国家的利益。那些口口声声不要以言论自由来损害国家利益的人，他们在行动上却大大侵犯了国家的利益！我并不胆怯，因为杀了我一个马寅初，还有更多的人会站起来！

这时伪宪兵团长走上讲台去制止马先生讲话；同时也有二、三同学跟着上台去把他拉下来仍坐原处，马先生继续说：

“同学们！不要担心我！我也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有更多的言论自由，立法委员有不因其政治言论而受法律制裁的权利。任何威胁也是动摇不了我的、希望同学们把我的主张和要求尽快地实现！再见。”

伪宪兵团长当即随马先生之后，走出大礼堂，一同上了吉普车，离开重大向市区方向去了。同学们在马先生临离校时，都十分愤慨地说：“真是暗无天日！爱国有罪！哪里还有言论自由？”也还有不少同学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当晚，商学院同学把马先生的讲演刻成蜡版，连夜油印、包封，写好寄达地点，第二天即投邮发至各地。

此后不久，听说马先生已被转送到息烽被禁锢起来。同学们得悉这一消息后，都感叹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先生这样大名鼎鼎、全国知名、全世界知名的人士都敢于下此毒手，真哪里还有半点‘民主’和‘自由’的气氛啊！”

二、赴湖南前线考察战地经济

一九四三年，当时马老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立法院内迁在重庆天生桥，朝阳大学内迁在重庆兴隆场，两地相隔不远，马老在朝大开设财政金融和国际贸易两门课程。

我（周之鹤），当时在朝大读法律系，一天下午从教授休息室门前走过，听见里边笑语盈盈、谈笑风生。朝内一看是经济系的十来位同学在听马老闲谈，我偕另一位法律系

的同学也参加进去。

马老说：“一九四〇年，那时我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因骂国民党当局激烈了点，骂凶了点，他们便派军统特务把我从重大抓走，本来要把我禁锢在息烽集中营，让我与世隔绝，但由于当时舆论上的压力太大了，才把我转到湖南前线，去考察战地经济。其实，哪里是考察什么战地经济啊！明明要用日本人之刀来杀我马寅初之头，有如三国时候的曹操阴险地要借黄祖之刀来杀孙权之头一样，好在当时文伯将军（文伯是张治中的号，他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在地件事情上没有“助纣为虐”，我才得全其首领归张重庆”。

马老更风趣地说：“当时在重大骂得稍‘文明’点的是奎元先生（奎元是中国早期著名数学家何鲁的号，他当时任重大理学院院长），张元到缙云山（缙云山在重庆北碚，距北泉六、七公里，是重庆的风景区）去找太虚法师（太虚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和尚，曾张斌印度，与圣雄甘地、尼赫鲁、中阴主麻林森等都有合榻偈），躲了七七，四十九天，方告无事。骂得更要文明点禁是子璧先生（指段子璧教授，当时任重大数学系系主任），他“闭门思过”，到朋友家闭门不出，打了七天麻将，就算把这场灾难躲过了。

马老最后感慨地说：“其实，当时只要是一个具有良心的中国人，谁又不牢骚数腹而骂上几句呢”？

三、讲演中痛骂蒋介石

在“独山事件”（指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军从广西大举进攻，直抵贵州独山，全国为之惊震）后，有一天马老被邀请来朝大讲演。这次主持讲演会的人是国民党元老、司法院

院长居正，参加讲演会的人有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

马老在讲演中，当谈到日本军阀的凶悍残暴、气焰猖獗，谈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谈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丧权辱国时，实在是怒火中烧而怒发冲冠了。马老当着那些国民党大员，当着一两千名师生，在讲桌上狠狠地痛击一拳，这一拳把讲桌上的茶盅盖子都震翻了。怒不可遏的马老高声地骂道：“有人（指蒋介石）说搞要学美国的华盛顿，兄弟（指高岗）竟有‘我’时的骄傲）认为，世界上华盛顿是只有一个的，兄弟却认为他桌一支真水管，为什么说他是一支真水管呢？因为真水管内是真空，通空气是没有，是一无所有，可他它的管嘴是封得严严实实，是绝对拒绝任何外界物质的介入。这个人也就是这样，他肚子内空荡荡也，一无所知，也一无所知，可是他非常顽固，只绝对相信他自己，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意见。所以，兄弟称他是‘真水管’。”

马老继续讲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说：“试问：大好河山只要一隅，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政府无能，贪污泛滥，全国人民居于水深火热之中，大有朝不保夕之势，所谓最高领袖到底有责任没有？”

马老的话得到一千多人的共鸣、愤怒的火焰燃烧着一千多颗听讲者的心灵；我情不自禁地随着大家振臂高呼：“反对贪污、反对无能、反对卖国”。同时，我却又想到：这种淋漓尽致的比喻，大快人心的责骂，排除早已成性的“当局”他能容忍吗？马老虽然是立法委员，有高度的言论自由，但我真有些为马老的政治前途和人身安全而感到担心！

我不自觉地看看台上坐着的那几位“党国要员”，他们都垂着头，感到非常沮丧！我再转眼看望在场的一千多位教师和同学，大家和我一样，内心沉重、表情愤满，却又暗寓几分担忧的情绪。

这时候，忽然听见马老以自返而不缩的气魄，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出离愤怒的语调高声地问道：“今天有特务在场没有？假如有，就请站出来，我马寅初并不怕子弹从我身上穿过！”这时场内有些骚动，在场的师生都用目光环顾全场，有的还在相互交谈，大家看的对号和谈论的主题，都不外乎“今天在场的人有特务没有？”

马老讲完话后，报告会主持人居正带着复杂的心情，板着面孔，走至讲桌前只说了一句话——报告会就此结束，现在散会！马老在前，居正其次，夏勤、谢冠生殿后，他们四人鱼贯地走下讲台，鱼贯地离开会场，他们都面无表情，他们都没有互相谈话。

师生们也相继离开会场，但情况却不一样。大多数人是表情非常愤怒，语言非常激烈，对国民党当局的胡作非为大加申斥；有的人对今天究竟有无特务在场？日后，马老会不会遭到迫害？在争相发言；也有人对“国家的生存，民族的命运，个人的出路”在沉思，在忧虑……

四、假帐问题

一九四四年五月的一个下午，马老应朝大经济学会的邀请作一次学术讲座，讲演的题目是——“关于假帐问题”。听讲的人多半是经济系的同学，但这新颖而离奇的题目却吸引了我前去参加听讲。会场早已座无虚席了。